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义

第三分册

中国现代教学会

1983年7月

中国现代史讲习班教材第三分册

目 录

第十一讲	瞿秋白思想研究.....	丁守和 (1)
第十二讲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前后的中国政治思潮	王维礼 (51)
第十三讲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和二战史研究	王维礼 (80)
第十四讲	关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评价的问题	王维礼 (104)
第十五讲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专题	张 扬 (113)
第十六讲	中国第三党研究	彦 奇 王幼樵 (144)
第十七讲	中国民主同盟史讲义	邱钱木 (180)
第十八讲	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专题	张宪文 (229)

附 录： 资 料

一、关于“田中奏摺”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计划	(259)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伐军级国民党军队序列	(273)

第十一讲 瞿秋白思想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 丁守和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其前后，是中国风云变幻，光明和黑暗激烈斗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掀起翻天巨浪，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瞿秋白同志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社会的刺激，时代的召唤，斗争的要求，使那时英杰辈出，群星灿烂。在这灿烂的群星中，瞿秋白的思想理论观点，显得颇为光彩耀眼。

瞿秋白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第一个直接系统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农奴国家状况的中国人。他热烈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国情，探讨和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革命危机和国难当头时，他和其它同志一起力挽狂澜，拨正船航，继续前进。在受到残酷打击后，他又发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他犯过错误，但决不讳疾忌医，而是努力改正。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的遗著很多，包括政治理论，文学译作等，总数在四百万字以上，其中虽然也有不妥之作，但这是烈士的遗产，思想史上的丰碑。研究瞿秋白的思想（包括错误思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吸取有益教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都是有益的。

一，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1899年1月，即戊戌年十二月生于江苏常州。那正是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失败了，继起的义和团运动也惨遭镇压。帝国主义的侵略益加深入，腐败的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残害人民。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使人民遭到极大灾难。中国社会的矛盾继续加深着。瞿秋白就是在这严重的内忧外患环境里成长的，因而他在青少年时代便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变革社会的愿望，他在黑暗中徘徊，探索着出路，然而什么是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他一时又弄不清楚。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世家，即所谓“士的阶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

固有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破裂，这种“士的阶级”也破产了。他曾说过，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体状态，同他心灵“内的要求”即个性发展，绝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其生以俱来。他的家世类似鲁迅，但更惨，母亲已为“穷”所逼杀，父亲也只是“穷”的遗物。依人的生涯，使他处于类乎游民无产者之地位。虽说有家族的维系，亲戚相维持，勉以为生，也不过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名曰是同舟共济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那垂死的家族制之痛苦，在几度的回光反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映出一心苗的光焰来”。^①他忧虑，思索，透过万重疑网，萌发着变革社会的心愿。

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的变动，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爆发，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然而，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者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者竟顺流忘返，成琦语谣话的烂小说生涯，瞿秋白没有顺流忘返，却也产生过厌世思想。这是对辛亥革命后现实生活失望的反映。鲁迅也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他很少活动，除在教育部上班，就是在北京绍兴会馆整理古籍，抄写碑帖，实际上是由于失望和对现实不满而陷入沉思。瞿秋白也有类似情况，不过他是考虑“整个世界生命的疑问”。

瞿秋白对“民国”的现实极为不满，特别是在他中学未毕业，不得不到社会上谋生（到无锡乡村教书）时，“更发现了无量无数的‘？’”。“人生的意义”“人与人的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经常在他心灵上纠缠着。1917年他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想将来从东亚文化交流探讨改变中国现状的出路。但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种种丑恶现象，又使他受一重大刺激。所以他曾有“避世观”，“厌世观”，一度心情是很灰暗的。然而现实生活又总是触动他对社会的疑问，使他的心灵不能平静。他博览群书，研究各种学问，希望从中找到人生的道路。他研究过佛学和国学，想从佛学“试解人生问题”，从研究和整理国故“做救国的功夫。”他爱好文学，又深究哲学，文学使他“笑怒哀乐未厌”，哲学使他思内的要求，发展个性；岳飞、文天祥的诗词曾激发他的爱国热情，老庄思想又使他向往平静和谐；他受到“家族旧思想”的培植，而“新时代的自由神”又移其心性；康德、狄德罗、卢梭、歌德、托尔斯泰都曾给他以影响，陈独秀请来的“德赛二先生”也使他感到“津津有味”。他痛恨旧社会的不合理状况，希望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他为解决人生的关系，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象一个苦行僧那样刻苦探求，冥想思索：“满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他说，在北京三年，“是我最枯

①《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一）第13页。

②《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

寂的生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社会无量无数的“？”，都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出路。

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一般都经历过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尽管思想倾向有所不同，有的偏重哲学伦理，有的开始变革文学戏剧，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或乌托帮，搞“互助”或“新村”试验，但他们都信仰或求追过革命的民主主义，并在行动上参加了一定的斗争。

瞿秋白有自己的特点，他也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发现许多问题，“有变的要求”，产生过“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的思想，但它更侧重哲理的探求。他在北京的三年，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许多青年卷入这一“新思想之大激战”，并且也曾震动他的心灵，而实际生活又使他“觉得人生孤寂的很”。他说：“这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论的人生观’。一部分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己生计的准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所以，比较起来，在早期，瞿秋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显得淡薄些。五四运动是瞿秋白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把他从“枯寂生涯”卷入斗争旋涡，使他久经压抑的心灵火苗在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中燃烧起来。他和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加学生运动。”他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知道社会中无名毒症，却不知道如何医治，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先与社会以震惊的刺激。同时，辛亥后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所表现的思想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巨浪，摇荡全中国。就是在这个“翻天巨浪”中，瞿秋白表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然而也就在这时或稍后，他又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这不是偶然的。瞿秋白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内在原因：“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影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去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①他自己的思想也是由此变化的。

瞿秋白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他作为北京俄专的学生代表，不仅自己参加示威游行，还组织同学参加运动，并同校内外朋友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在“六三”时，他和同学们上街进行爱国讲演，被反动政府逮捕。但他毫不畏缩，鼓励同学们继续坚持斗争。

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因此，紧接着政治斗争的高潮便是思想讨论的深入，在广大知识青年中掀起了学习新思想和讨论社会改造问题的热潮，当时思想

①《瞿秋白文集》（一）第23页。

界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有民主主义，有社会主义，也有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等，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是泥沙具下，除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想互相矛盾，互相激荡，人们往往受多种思想的影响。但是，先进分子经过学习和实践比较，很快认识到，他们所接受并为之奋斗的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新文化，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受到很大教育，他清楚认识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加强了他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兜底翻”的革命思想。1919年11月，他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创办刊物，猛烈抨击旧社会和各种旧思想，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问题。他说：“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当然，他们的讨论还是模糊的，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源派，社会主义意义，都还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当时的思想界就像久壅的闸门，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其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潮大多是如此。但就是在这些讨论中，他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在《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研究和宣传劳动问题，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他揭露旧社会的种种罪恶，攻击统治阶级，主张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他说：中国人“要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实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①“我们想改变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根本改造社会一切组织”。要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变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他深切同情劳动人民，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资本家要行经济侵略主义，所以要用劳动者来做他的机械。”又说：“农业国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直接间接的强暴侵略。……我们农人三年水四年旱，一天够两天短，寅年吃卯年粮，地主贷块钱却巢出五担米。”^②他鼓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的利器”进行反抗斗争。他不赞成青年自杀，认为有为的青年应该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细心观察社会的病源”，要有“热烈的感情”，也有“沉静研究”，要从这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社会里找到一条道路，在这暮气沉沉的世界里放出光来。在《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中，瞿秋白分析了新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的，并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的新村主义作比较，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是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进步的办法，不至于像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园”。他相信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胜利，他说：“胜负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瞭的——世界的进步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究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他在《伯伯尔

①《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②《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见《新社会》第8号

③《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谁的利器》，见《新社会》4、17号

的泛劳动主义观》一文中，表示赞成蓓蓓尔“主张建设新社会——将来的社会，主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的观点，赞成“劳农革命”，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严”，在这不久，他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等发起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当然，瞿秋白当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还不是清楚的。但是他也用形象的语言作了说明：“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这些吸吮中国人民精血的毒虫，在中国头上画负号的魔鬼，不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吗？正是它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中国贫穷落后，社会问题丛生，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瞿秋白赞成的“根本改造”，“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就是要深入一层，把这些毒虫、蚊蚋、魔鬼根除。

在当时，瞿秋白已开始翻译俄国文学，研究苏俄的新文学家。1920年3月，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一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状况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惊醒了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瞿秋白的言论，反映了先进分子，根据俄国革命经验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倾向。

1920年9月，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邀请，决定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去苏俄。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此机会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实际情况，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他在《饿乡纪程》中曾多次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阴沉沉，黑黯黯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兄弟们，预备着。倘若你们不因为久处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我决不要忘记你们，我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周的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思他的缘故，这问题真太复杂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我呢？以哲理思想方法入手，……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知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我们看到，这是一颗多么热烈跳动的心啊？

十月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对布尔什维克和劳农政府极尽歪曲宣传之能事诬蔑它是“洪水猛兽的过激派”。另一方面，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的破坏，新的苏维埃政权也确实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也使人民弄不清真相。但是瞿秋白不管这些，他毅然决然到“饿乡”寻找真理。他去告别朋友时说：“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

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去送别时，其叔瞿菊农以诗相赠：“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秋白也以诗相答：“若说是——采花酿蜜蜜蜂成时百花谢，再回头，灿烂云华”。

瞿秋白以满腔的热忱奔向列宁的国家。“起程了、起程了！向着红光里去！”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在路上，他和同行的俞颂华作了分工，由俞负通信事务的责任；而他则决定了“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俄罗斯文化。”他把共产主义比作“心海中的灯塔。”并且勉励自己：“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航舵，前进！前进！”

在瞿秋白刚到苏俄时，为了向俄国工人表示敬意，同时为了说明他来俄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苏俄的情况，以便“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一个推动”。他写了一篇《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于俄国的期望》刊登在1921年2月27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上。他说：“中国陷在落后的黑暗境遇中。中国无产阶级只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已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万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瞿秋白着重向苏俄人民介绍了中国情况和工人状况，指出中国的真实的政治状况是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我们的人民。他们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仅仅只考虑着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中国无产阶级遭受苦难，甚至知识分子也经历着难以言状的痛苦。”“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无产阶级非常痛苦，可是还没有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希望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传授给他们知识，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诚恳地希望承担起这一责任。”

在苏俄的两年中，瞿秋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动。他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他访问工厂、农村、苏维埃机关、文化团体等；他担任东方劳动大学的翻译和助教、并出席过远东劳动者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次见到列宁，对列宁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如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言非常流利谈吐沉重果断，演说时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的材料。这也反映了列宁对东方问题的关注。又如在一次工厂的集会上“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动群众之心中，这层意思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瞭。“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①

①《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一）第128—159页。

通过学习研究和实际工作，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有了较深的了解，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他认识到“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靠于实际”。“抽象的‘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决不能象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劳工神圣、理想的天网，不在于知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转进。”因此使他“更加确定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瞿秋白过去很强调“内的要求”，个性发展，年轻时由于个性受到环境的束缚压抑，他的思想曾是灰暗的。他在苏俄时也说过“要求改变环境发展个性”。然而两年的实际观察体会，他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求得社会的放，才有个性解放。只有置身于群众之中，为人民服务，才能摆脱孤寂苦恼，获得前进的力量。他说：“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何容你呖语连篇的求解放呢？”“梦幻！梦幻！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又说“‘为人服务’忘了这一‘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的孝子贤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的稚儿”，我自是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①瞿秋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伟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为人民服务，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就在这时，他由张太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在苏俄期间，瞿秋白虽曾肺病发作，仍写了一系列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颇具哲理的散文作品，记述了他决定去苏俄，一路到苏俄和在苏俄期间的思想感情，心程中的变迁起伏，读书心得，冥想感会等，是他心理记录的底稿，反映了一个东方进步青年在赤都的成长。他还写了从理论上探讨俄国革命的《俄罗斯革命论》以及《俄国文学史》。此外，并写了大量通讯报导，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连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有三十五篇达十六万字之多（邮寄中还遗失许多篇）。其中包括《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苏俄经济改造之新气象》、《苏俄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赤俄之第四年》等等，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作了系统的报道，并介绍了列宁的一些讲话。这是中国人根据直接考察访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所作的关于苏俄方面情况的全面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澄清了人们的误解，使人们认识到劳农国家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从而得到鼓舞，引起向往，郑振铎回忆说：“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限的读者们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心情。我相信，那影响是很大的。”^③

瞿秋白作为一个初具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闻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并没有回避俄国革命所遭遇到的困难和经济上的破坏，而是作了真实的报道，但他更指出了在这些困难和窘况的后面发生着一个多么深刻剧烈的变动，这个变动本身具有摧毁一切和建设新的美好幸福生活的强大力量，作者记载了旧的反动没落势力的垂死挣扎，但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势力已走上无可挽回的灭亡的道路，而新生的革命力量却显得那

^①均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

^②瞿秋白入党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是1922年2月，但据《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说：1921年“五月，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

^③《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么可爱，不可战胜。他已开始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就愈加深刻。他说：“欧战四年内乱三年的俄罗斯，实在经过了不数惊天动地的变更，古今未有的困苦，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①“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步步证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革命的伟力各方面的发展，几十次困苦的战斗，全赖两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十月革命时这两个阶级结合一巩固的协约（即联盟），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收得大工业与土地，虽负巨大的牺牲，在斗争过程中竭尽全力以向共同之敌，警策戒严，强弩满挽。”^②他正确地看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认为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是不可免的。他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的长篇通讯中说：“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哪能一跳便入天堂。”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它已经开始在人间实行起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因此，瞿秋白认为：“这一层中国人应用一用心，俄国革命更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呀！”

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

瞿秋白1923年1月回国。当时帝国主义正在中国进行激烈争夺，以此为背景，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不已，肆意残害人民，帝国主义的军警也到处横行。在统治阶级中，什么“最高问题（即总统问题）、阁员问题、制宪问题等，丑闻百出，唯独“最低问题”即人民的最低生活及至生命问题，不值一顾。瞿秋白本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与国人一谈，不料到北京三天，所接触到的中国现实，使他“受异常刺激”，便立即写了《最低问题》一文，说明他回来见到的是“狗彘食人的中国”，谴责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军政府。”他呼吁平民群众、爱国学生，有志青年速醒，为保住人民的吃饭权生存权，而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统治的勇猛斗争。

瞿秋白回国不久，即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参加筹备党的“三大”，准备党纲草案，筹备上海大学和党的理论刊物，参与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的商谈，尤其是党的理论宣传等，做了许多工作。

著名革命刊物《新青年》，从1922年7月出完九卷六期即未再出。党中央决定把它改组为党的理论刊物，由瞿秋白主编。经过瞿秋白的努力，《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于1923年6月出版^③并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④，公开宣布它是“无产阶

①《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一）第200页。

②《赤俄之第四年》，《晨报》1922年8月16日

③《新青年》季刊仅出四期，1925年9月又改为月刊，但未能按期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刊，至1936年7月共出五期，即停刊。

④这篇宣言未署名。从当时情况看，作者有可能是陈独秀或瞿秋白。但从几方面考察，我们认为只能是瞿，而不是陈：一、本期从封面书写魏体刊头、设计“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图案，译《国际歌》、作《赤潮曲》，到编辑校对均瞿所为，全部论文为瞿所写，陈仅一篇译稿，他当时主要力量在《向导》和准备“三大”。二、宣言开头以歌德诗为引，这在瞿文中常有，在陈文中则未见。三、宣言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陈当时恰无。

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另外，他还先后担任党刊《前锋》、《向导》的编辑。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主要是理论方面的，在《向导》上的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上有几篇是探讨社会经济问题。他从回国到五卅运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上百篇，涉及问题很广，而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指导革命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它给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争取解放的最锐利武器。瞿秋白一方面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并翻译介绍马列的著作、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另一方面，他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他一再指出：“革命和理论永远不能和革命实践相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①他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资本主义趋势，以确立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政策，“作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瞿秋白的论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的尝试，并呈现出光辉的成就。尽管其中也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其总的思想是“想利于革命实践的”。事实也是这样的。

瞿秋白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状况，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他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变化，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和军阀统治的祸害，指出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取得民主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使中国“摆脱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②他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肯定当时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③中国革命现时的职任还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多分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根本是“农地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他们的要求如耕地农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等，”“很明显的是民权主义的要求，而并非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它与俄国1905年的革命不同，它“决不是无条件的资产阶级性革命，而只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这是因为时代条件的不同。中国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加入俄国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成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也

①《瞿秋白论文集自序》，《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②《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

③《自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2期，本文发表时标题中是“自民治主义”而目录广告是“民主主义”1927年初作者编《瞿秋白论文集》时改为“民权主义”

得了新的使命”，即“中国的无产阶级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并在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下，“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①瞿秋白虽然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但是他已经把这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同以前的旧的民主革命相区分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是哪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的问题。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二大”后党内很多同志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瞿秋白首先作了阐述。1923年6月，他在《新青年的新宣言》中指出：“中国现实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正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功”。中国“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同年九月，他在《自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和列宁《两个策略》的有关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展开”所以，“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可是愈落后的国家他的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愈有势力，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也愈多。”他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性革命即国民革命，非有无产阶级参加不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彻底革命“彻底的扫尽旧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他还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性革命取得胜利，决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平民的革命民权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中国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随后他又多次谈到：“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民族革命运动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的领袖阶级。”^②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渐渐的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个革命的领袖阶级”^③。这样瞿秋白就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

列宁指出，在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里，“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④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它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系统的分析。

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

②《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新青年》月刊第2期。

③《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113期。

④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瞿秋白从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出发，指出中国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之政权。”^①中国人民都处于它们的统治剥削之下。因此，中国革命就是“进攻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打倒这些敌人，解放中国人民。

瞿秋白从中国的经济关系分析，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导源于帝国主义，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据此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他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扰乱民族经济，破坏中国争独立解放，是革命的敌人。而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帝国主义极重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有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它又是有动摇性妥协性，“不完全反对列强及军阀到底”，“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②因此，无产阶级既联合他革命，又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惧妥协”。

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瞿秋白着重强调他们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小资产阶级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由于感到种种压迫，“必然倾向革命”，他们的“革命化是不可遏制的”，但在政治上“须无产阶级之领导”。中国农民人数最多，是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其中雇农贫农是最彻底的革命分子”。因此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广大农民，“才有真正的民权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③

对于工人阶级，瞿秋白作了多方面分析，指出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阶级还“幼稚”，但因为工人阶级所受压迫剥削最深重残酷，革命性也最坚决彻底，他反复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制度和资本家的重重压迫之下，“他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斗争里的先锋”^④“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象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的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⑤他还讲到无产阶级是同大生产相联系，因而是最有组织和有团结力的阶级，而且很集中，同农民有许多联系等，无产阶级也有一些弱点，如许多工人还未脱离小农业小商业的关系，还往往受宗法和家族思想的影响等，但还是可以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革命实践

①《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

②《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第1期《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自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

③《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大家都是良民哪来的匪》《向导》第35期

④《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向导》第125期。

⑤《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向导》第125期。

中逐渐克服的。

就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瞿秋白阐明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政策，他说：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经济状况有详细周密研究，确定国民革命到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就是：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般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均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因为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或联合，那末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且就应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个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五、中国革命将来要“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①这是瞿秋白对自己在《新青年》《前锋》上文章的观点的概括，对当时党的政策的宣传显然有重要意义。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瞿秋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参加了党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上他批评了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反对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左”倾观点。会后瞿秋白又写文章，针对张国焘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发生关系”。于是“有些洁身自好的社会改造家好一似黄花闺女柏舟孀妇，要大叫起来：这不是要玷辱我们无产阶级‘家声’吗，抛头露面的像个什么样子，其实大谬不然。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主运动，同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战线，诚然有改良化的危险，然而却并非不参加便能免祸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党参加民主革命能否受资产阶级“恶化”并不在于某人某领袖要投降资产阶级，亦不在于党内某一派保持了形式对于民主运动的“独立”，而主要在于党的政治思想和纲领是否合于实际，能否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势力。如果不符合实际，“与群众脱离”，“不能尽领导之责”，那种形式上的独立，反而很容易跟着“自由派”模糊的政治标语走，如欧洲的社会党。他说：“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门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便篡得了领导权，而是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②

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也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观点。他和陈独秀在建立联合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是相同的，但是，对各阶级及其作用的认识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瞿秋白起草的党纲草案，陈独秀就作了多处修改。例如：原文“在革命中间，只有无产

^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新青年》月刊第3期。

^②《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部分：”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难成功”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促进全国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尚且偷安的资产阶级”等。瞿秋白在三年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是苟且偷安罢了。……所以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的领导权这一层意思，完全抹杀。①他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就是在草案中“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在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没有土地问题”。①他认为这个经验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瞿秋白在总结“三大”的争论时，引用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话来说明，共产主义派主张支持一切革命运动，他既不隐瞒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又提出和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列宁说：“理想的社会民主派不应当仅是‘工会书记’，而是‘平民使者’，应当对于一切压迫和专制，不论他是关于那一个阶级的，都加以攻击，汇合一切现象而本人以警察攻富豪地主之残暴的总概念”。“往各阶级间走，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谁实际上忘了‘共产主义派赞助一切革命运动’，谁忘了我们应当在全体平民面前，既不隐藏我们社会主义的见解，又要明白指出民权主义的总责任，那人便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谁实际上忘了自己应当在人人之前提出鼓动并解决一切民权主义的总问题，那人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瞿秋白还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付精神的去参加，是教无产阶级不要专守着经济斗争而要参加总的政治斗争，努力去争取民权主义，争那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②只有按照列宁的教导，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胜利。

瞿秋白对国共合作和共产党改组的观点是很明确的。1923年9月，他就分析国民党的状况，公开提出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他说：“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确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但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的动象，就需要“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对如何改造国民党，瞿秋白也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他认为，所谓“改造国民党”，就是在政治上“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主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在组织上要“淘汰”国民党以前的“不纯分子”，“肃清腐败分子”，对在行动上与党的政治主张不适应

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二章“附言”。

②《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的分子也“立刻请去”；同时要“集合实际生活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分子于此党”，也就是要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工人等参加国民党。总之，就是要把它改造成新的群众的民主式的、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的革命政党，他认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决不是要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而是坚持它的阶级独立性，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发展联合战线，推动国民革命，同时也使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成为群众性的党，“于是劳工派在国民运动中的基础，亦就因此凝聚起来”。^①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及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党的领导下，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三大政策，民族民主革命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曾多次同孙中山交谈，他所提建议受到孙中山重视和采纳。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宣言就是由瞿秋白起草，孙中山签署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曾说过：“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②瞿秋白稍后曾谈到这个宣言有很鲜明的三个目标：“一、要把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二、要从横暴的军阀官僚手里夺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三、要使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③瞿秋白对国共合作形成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等在全国迅速展开，以至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形成全国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高潮，瞿秋白亲自参加了这些运动，并及时发表评论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罪恶，继续阐发和宣传国民革命的思想，鼓励和指导人民的斗争。

上述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联合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等问题，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瞿秋白对这些问题所阐明的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重要成果，放射着时代潮流的光辉。当然，他的文章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如“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等，这在党的幼年时期是难免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写革命，毋宁做革命”。他的论著就是“做革命”的成果的一部分，他决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书斋里的装饰品，而是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武器。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找到能运用这些客观规律的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的中国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经

①《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49期。

②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8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③《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瞿秋白讲演，单行本。

④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8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⑤《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瞿秋白讲演单行本。

济上政治上的斗争，能领导起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能建立强固的革命中枢，而实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①这是瞿秋白的亲切体会，他就是应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正确认识的。

瞿秋白对思想领域的斗争也非常重视。他经常研究思想界的动向，注意出现各种错误的或反动的思想，进行有力的批判或澄清。例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之分，而无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别，沈玄庐的所谓中国只有“有闲阶级和无闲阶级”；还有所谓“有权兼有钱阶级”和“无权兼无钱阶级”；章士钊的“农村建国论”，即所谓“农业国的社会主义，梁漱溟的“东方文化论”；张君勱的“忽而主义即“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胡适的所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海外奇谈”和“尝试善后会议”；国民党右派的反共主义；曾琦、左舜生、李璜的国家主义，以及稍后出现的戴季陶主义等。对这些谬论或错误观点，瞿秋白都及时进行分析、批判和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阶级关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他在论文集《自序》中谈到这部分文章时说过：“思想的战线上，我不能不对于当代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即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勱、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一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见他们公开的直接回答，是否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1923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一场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论争的双方，玄学鬼张君勱固然是唯心论，打着“科学”旗号的胡适等也是唯心论，他们谁也没有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但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两种倾向，张君勱既贩卖柏格森的“自由意志论”又称赞中国精神文明，宣扬心学；胡适派鼓吹实用主义，称赞西方的物质文明。马克思主义干预了这场论争，《新青年》连续发表陈独秀、瞿秋白的文章进行评论。瞿秋白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辩论，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正面论证了“自由”、“必然”的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果律），批判了张君勱的自由意志和心学，以及梁启超的所谓生活原动力就是“感情”的论点，也反驳了胡适的实用主义，指出“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的近视的成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②宣传了辩证（互辩律）的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瞿秋白写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也批判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依据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特点，指出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世界现代文明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这个发展又必然经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到那时，人类才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③

①《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1期。

②《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期。

③《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21卷1期